

图片·光盘版

制度分析基础

一个面向宽带网时代的讲义

汪丁丁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 Broadband-Based Lecture
on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 Broadband-Based Lecture
on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 Broadband-Based Lecture
on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制度分析基础

一个面向宽带网时代的讲义



汪
丁
丁

著

A Broadband-Based Lecture
on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分析基础：一个面向宽带网时代的讲义/汪丁丁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
ISBN 7-80149-743-0

I. 制… II. 汪… III. 经济制度—分析 IV. F0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2180 号

制度分析基础 一个面向宽带网时代的讲义



著 者：汪丁丁
策 划：创世纪工作室 路卫军
责任编辑：李玉平 屠敏珠
光盘编辑：郭 鹏
责任校对：刘玉霞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9.25
字 数：313 千字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743-0/F·241

定价(含光盘)：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按 语

为什么我要把这套讲义命名为“面向宽带网的讲义”呢？首先，这套讲义的阅读材料完全来自宽带网。其次，它的写作过程完全离不开宽带网提供的即时资料搜索，许多人物（包括一些比较难得的照片或肖像）与事件的历史都要直接从网上检索、确认、然后再加以综合，写入讲义。第三，我建议读者在阅读这套讲义时，做好随时上网搜索的准备，对有疑惑的概念和观点，读者应当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立刻“上线”检索合适的阅读材料，搞清楚了基本概念之后，再“下线”，继续阅读这份讲义。

汪丁丁

2001年5月23日—2001年6月16日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目 录

按 语	1
第一讲 导论——从现代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开始	1
第二讲 叙事、教材、思的路径	34
第三讲 方法、意义以及现代经济学不打算面对的经济现象	64
第四讲 康德《逻辑学》——导论	92
第五讲 康德《逻辑学》——康德思想体系概观	123
第六讲 康德《逻辑学》——正文	152
第七讲 社会科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182
第八讲 从制度经济学到知识理论	210
第九讲 生命、市场、均衡；知识论、代数格、 文化现象及其他	245
结 语	291
附 录 “制度分析基础”八十篇阅读文章的主题索引	293

第一讲 导论——从现代 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开始

大家好，我们这门课在浙江大学的课程表里面叫做“新制度经济学”，但我要讲的内容其实应当叫做“制度分析基础”，因为它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让我先说导论部分，不过真正的“导论”或许到下节课才能讲完，这次我必须先讨论我们上这门课的目的，也可以叫做“导论的导论”。

这门课讲的是“制度分析基础”。不过我们要讨论“制度分析”的基础部分之前，必须先讨论清楚“经济学”是什么，毕竟我们的视野是从经济学拓展到制度分析领域的。在高鸿业教授翻译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写的那本《经济学》三卷本里面，“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上的理性决策过程。用那里边的话说，经济学就是要回答：“What to produce”，“How to produce”，“For whom to produce”。这是萨缪尔森所谓的“新古典综合”为经济学研究者勾画的范围最广的现代定义。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还有许多人提出了狭义的“经济学”定义，但当时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完善与萨缪尔森的个人努力实在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70年代以前，“主流”经济学不是在芝加哥大学，而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萨缪尔森既是肯尼迪做参议员时的顾问，又是他做总统时的经济问题顾问。后来，60年代中期，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后，逐渐地，到了里根时代，共和党的“古典自由主义复兴”开始成为时代的主流，于是芝加哥学派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如果当时不发生这一复兴运动的话，那么今天的经济学主流或许仍是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我们看今天美国学术界的状况，可以感觉到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主流经济学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批评，这批评来自芝加哥学派内部以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



英国剑桥大学等“非主流”经济学。不论如何，在当时，萨缪尔森领导的麻省理工学院主流经济学所讨论的“经济学”就是要对上述那三个问题提供解答。上面的照片是1963年11月22日上午肯尼迪在达拉斯讲演的场面，他于演讲之后遇刺身亡。然后，麻省理工学

院经济学就如同上页那幅照片里的肯尼迪灵柩车队离开白宫那样，与“主流”身份告别了。

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初，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见照片）去领诺贝尔奖，他发表的演说题目是“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生产的制度结构，这篇演说所总结的科斯那一“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贡献，就是把新古典经济学里的“生产函数”概念给展开了。展开之后，“生产”就可以有一套“制度结构”。其实，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生产函数从来不是给定的，因为那时候的经济学家，如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人，都注意到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一定要包含对生产制度的考察。后来，萨缪尔森提出所谓“分离定理”，把效率问题与分配问题当做两个可以单独研究的问题。



再后来，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放弃了对分配与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换句话说，他们放弃了对生产的制度条件的研究。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在单纯对效率问题进行研究时，已经隐含假设了一套不变的制度条件，或者预先假设萨缪尔森“分离定理”成立。那么，当制度条件确实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生产或许无法达到原有制度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所谓“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或简写为“ppf”）。这一点在过渡时期的俄罗斯和东欧经济里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时候，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就显现出来了。我们说，科斯的贡献在于研究了生产的制度结构，他在这篇演说中也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生产的制度结构”。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演说的后半部分，在刻画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时，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我认为值得倡导，他呼吁建立一个资料研究中心，专门用来收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契约。这个中心的重要之处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第一次把生产函数所代表的“技术”从一个黑箱状态里解放出来了，它要研究生产的制度结构，但苦于没有充足的实证研究资料，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资料中心，收集世界各地和各个朝代的不同的契约，看看我们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契约形式和主要演变路径。回顾经济学发展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感觉到，对制度分析而言，方法论问题或许非常关键。这正是我下面要讨论的题目。

最早研究经济学实证方法的学者，除了说英语的“央格鲁－美利坚”学者们，还有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奥地利人，但是现

代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大家公推应当从萨缪尔森（见照片）的1947年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开始，当然那也是他获得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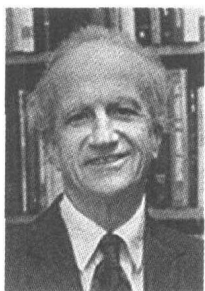
（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写完这篇博士论文的，中间隔了整个“二战”时期，直到战后，1947年才发表，他是当时人们公认的年轻天才，不很在乎自己学术成果什么时间发表。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这本书中全面地把经济学方法整理成为以数学表达的研究方法，这是他的贡献，所以我们说，是萨缪尔森为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实证方法。

这一套方法，如果你去读萨缪尔森晚年出的五卷本文集，那里面认同的方法，其实也就是芝加哥学派的方法：对于那些不可观测的量，我们把它们全都设为“前提”条件，这些前提设定了任何问题的经济分析在三个方面所必须的“边界条件”——偏好、技术、资源（或者说资源供给、资源储量）。顺便提一句，我一直不愿意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个词，即“sustainable development”，因为什么叫做“可持续”，这个概念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过，归根结蒂，它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更进一步，经济学家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什么是“技术”？如果没有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那么经济学家就没法懂得技术是什么，那是工程师的事。工程师把“技术”给定量化的，成为一个“生产函数”。其次，“偏好”，这是心理学家的事情，心理学家告诉经济学家什么是“偏好”，经济学家只是拿来用而已。最后，“资源”及其结构，那从来就是不可知的，经济学家知道地底下储藏着的“资源”的数量吗？不知道，因为经济学家根本不分工研究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不是“资源”，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分工研究这些问题，他们告诉经济学家说：“原子能”终于可以被视为经济能源了，因为技术进步已经使得这一能源的获取足够便宜且足够安全；“太阳能”现在可以当做一种“资源”了；用风车来转换风力能源，人类早就普遍使用了，但这种风能无法储存，断断续续，不好用；最后是“海潮能源”，工程师告诉我说还得等待几年，目前还无法利用，至少，目前利用这种能量的费用太高；此外，还有许多种类的潜在能源，例如地热、生物能、太阳能，都可能成为未来人类的重要能源，但现在还不是。给定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些知识结构，经济学家根据科学技术家的分析

和统计，确定出目前可用的总的能源数量，当然是带有结构的（能源结构即多少万吨煤、多少万桶石油、多少千瓦水电、多少千瓦原子发电能力，等等），再根据这一资源储量，即一般均衡模型里面的“资源禀赋向量”，来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但如果我们把这一研究方法不加思考地推广到“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这方法就失去它的科学根据了。因为“可持续（sustainability）”的含义是经济沿“时间”的持续运动，请问，我们画得出来资源储量沿时间的轨迹吗？不能，因为我们根本就还没有经济学的“资源”定义，那是工程师的定义。你必须用经济学的概念重新整理，对“偏好”、“技术”和“资源”（或者说资源供给、资源储量）这三个主要结构的研究，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它们是经济学家从其他领域里拿过来的东西。而且，上面的讨论还告诉我们，当这三个结构假设发生变动时，它们之间往往发生相互作用。例如，技术结构的变动可以使原本不是资源的事物现在成为资源。事实上，没有可以脱离特定技术而存在的资源，也因此，我常常倾向于把这三大结构简约为两大结构：偏好结构与知识结构。当然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人的偏好结构是受其知识结构影响的，例如欣赏音乐、品尝美食、穿戴打扮等，在这些方面，消费的偏好总是依赖于相应的教育水平。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为偏好结构完全被知识结构决定。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两大结构确定为一切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或必须给定的前提。不过，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依然沿袭经济学传统，假设给定的是“三大结构”。

给定了资源、技术、偏好及其结构，在这三个前提假设下，就可以讨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了。他讨论“效率”，这个效率不是一般制度下的效率，而是“完全竞争”制度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完全竞争在这里不是一种现实的假设，很多人批评经济学家这个假设不现实，为什么经济学家死守着它不放呢？仔细看看，我们会发现“完全竞争”是一个工具性的假设，就像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假设那样，那并不是经济学家天然具有的立场，确实有不少（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否定了自由主义立场，因为那只是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工具性地引入的假设。后来，主流的经济学家都不主张初入经济学门径的人研习方法论问题，因为争不清楚，只能从实践当中自己体会。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见照片）在二十世纪5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叫





做“实证经济学方法”，但这篇文章广受争议，而且主要受到那些专门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人的批评，萨缪尔森到现在还在批评贝克尔（Gary Becker，获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见照片）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当然，弗里德曼的贡献很大，但是他这种方法论在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奠基者萨缪尔森看来，似乎不对头。出于几乎同样的原因，张五常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授“新制度经济学”时总要用四分之

三的时间来讲方法论，这是他自己说的，他的学生都不懂为什么要这么重视方法论。因为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心里明白，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是行不通的，是不那么好用的。为了要解释不同的经济制度，我们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超越主流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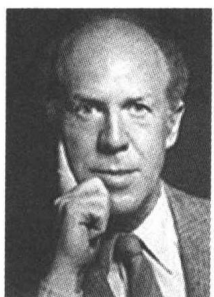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来讨论“效率”概念，如前述，效率在主流经济学中是指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效率。现有的数学工具没办法处理一般制度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垄断竞争是一种制度，我们没有可以处理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在这样的世界中，企业都被逼到必须以最小的单位成本来生产物品，所有生产者的单位成本都一样小，这样你才不必去观察生产的内部过程及其成本，于是你就可以“假设”这一单位成本是最小的，因为在完全竞争中，不能保持成本最小，企业就生存不下来，也就无法被观察到了。

我们画一条“U型”曲线，横轴表示单位时间内的总产出量，纵轴表示单位产出的成本，可以有“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或者“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我们只讨论平均成本即“单位成本”。刚才说了，在完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必须都在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上。于是，我们能够从这样的微观层次，逐步集结到宏观经济学关心的各种参量，例如“GNP”。

重复一遍，在给定了关于“偏好”、“技术”、“资源”三大结构的假设后，“一般均衡”状态可能存在。所以说，这些东西对经济学而言都是工具性的假设。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说，“完全竞争”是揭示资源有效配置所必须的信息的机制之一，有了这个假设，人们甚至可以用大型计算机把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那些参量计算出来，所谓“计算机社会主义”。

我记得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半个世纪里，由于有了萨缪尔

森用“分离定理”所表达的工具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包括麻省理



工学院和芝加哥学派在内的主流经济学，逐渐不再去研究经济行为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他们研究单纯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当然，这一情形在最近几年有所改变。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德布鲁（Gerard Debreu，1983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见左边照片），50年代初期，他还是

法国很年轻的数学家，被他的老师阿拉依（Maurice Allais，198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见右边照片）推荐给阿罗（Kenneth Arrow，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进行经济理论方面的合作研究，并由于这方面的



研究成果，他和



阿罗共同被誉为“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我们来讲讲他所讨论的“效率”概念，特别是他在1951年的一篇论文里提出来的“效率分解”问题（“the coefficient of resource utilization”，*Econometrics*）。左边照片是阿罗年轻时的样子。

首先我要指出，我们永远都不应该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效率，因为现实世界里没有这样的“效率”。如前述，如果不在微观层次上先有对于“效率”的度量，就根本不会有集结到宏观层次的效率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要批评宏观经济学的原因，大部分宏观经济学不讲究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研究。“效率”概念必须从“工厂”、“车间”、甚至如泰勒（Frederick Taylor，见右边照片）血汗生产制度那样，要从生产线工人的每个“典型动作”这一微观层次开始讨论，从最基本生产环节开始讨论，然后才有可能把它逐渐集结为更高层次的“度量”，如果可以度量的话。



为保持我们看问题的视角的单纯性，我们只得以后再讨论科斯所说的“带有制度结构的生产过程”。现在先讨论一个给定的、完全静态的新古典生产函数， $Q = F(L, K)$ 。根据这一函数，我们可以画许多条“等产出曲线（isoquantities）”， $\bar{Q} = F(L, K)$ ，其中 $\bar{Q}$ 是任意给定的常数。我们可以仅仅讨论所有这些等产出曲线当中典型的一条，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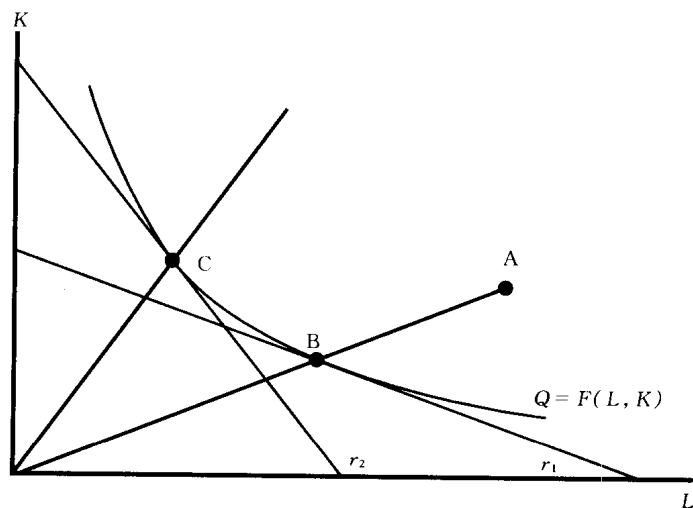


图 1-1 德布鲁效率分解

现在我们看图 1-1，横轴表示“劳动”（L），纵轴表示“资本”（K），这里我们必须马上讨论往往被忽视了的投入品的度量问题。我们关心的，是单位时间内的生产状况，即单位时间内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所以，这里的“劳动”与“资本”都必须表示为单位时间内的投入量，即通常所谓的“流量”（services），而不是“存量”（stocks）。

例如，当我们要考察时间单位为“一年”的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关系时，我们通常用“劳动小时”来度量这一年内，就所考察的生产过程而言所投入的劳动力服务的总量。显然，我们会询问，难道对不同质量的劳动，我们就如此简单地一概以“劳动小时”来度量吗？如果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门课就得改称为“劳动价值理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去深究劳动价值的衡量尺度问题，我们只是简单地假设“存在着这样的价值尺度”，从而一切不同质的劳动都可以相互折算，例如复杂劳动的一小时等价于简单劳动的两小时，我北京家里的小保姆八小时的劳动折合成我在这里讲课的复杂劳动，大约是一小时。总之，依

靠诸如此类的折算，我们可以把单位时间内投入特定生产过程的全部劳动换算为同一质量的劳动单位，然后把全部这样的劳动单位加总，得到图 1-1 的劳动量“L”。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度量这一年内投入的资本服务的总量呢？在经济思想史上，这个问题比马克思努力要解决的“劳动度量”问题提出得晚，但也更加复杂，引发了许多争论，成为“两个剑桥之争”这样的长期理论论战的主题之一（从二十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波士顿剑桥区的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发生的所谓“资本问题大论战”，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中期，不了了之）。

不论如何，如果不考虑资本品的结构问题，我们就总可以在最微观的层次上度量单位生产期间内投入的资本服务的总量，例如，我们可以用每台机床每年运转的时间乘以它的运转强度（千瓦小时），来度量资本存量在这一年内提供的服务总量。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抽象掉了诸如厂房和运输工具这些不同生产设备之间的差异，我们隐含地把这些资本存量提供的服务的质的差异都折算成与这台特定机床同质的服务量了。

即便作了如上的多重简约，我们还是面临着如何测度“人力资本”的投入量问题。我们知道，这一概念在现代经济的理论与实证中特别重要，可是在测定要素投入的时候，究竟是把人力资本折算为劳动量呢？还是折算为资本量？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扎实地解决，不过在实践中我们倾向于把人力资本折算为劳动量而不折算为“千瓦小时”那样的资本量。

现在让我们讨论图 1-1 所示的“德布鲁效率分解”，这里点 A、B、C 的坐标分别为特定产量 $\bar{Q}$ 所要求投入的劳动量和资本量，也叫做生产的“状态”。可见，不同状态的生产所对应的劳动和资本投入量有不同的组合。经济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判断这些要素组合的经济合理性。

图 1-1 的两条直线分别表示在劳动与资本的不同相对价格 (r_1, r_2) 时的要素成本预算线，这里的相对价格 $r \equiv \frac{R}{W}$ 可以由例如资本品的租金（元/千瓦小时）对工资率（元/劳动小时）的比值（劳动/千瓦）来度量。预算线的斜率为 $-r$ ，故对应于较小的 r （例如图 1-1 假设 $r_2 < r_1$ ），预算线的负斜率也较大。换句话说，斜率 r 决定了相对价格或者说决定了企业生产的成本边界，即给定要素价格，为生产 $\bar{Q}$ 所必须的最小投入成本（ $AC = WL + RK$ ）。从图 1-1 可见，给定要素相对价格 r_1 ，这一最小成本对应于点 B，给定要素相对价格 r_2 ，这一最小成本对应于点 C，我们知道，点 B 和点 C 是各自所对应的要素价格的“均衡”状态。当要素价

格变动的时候，均衡点就从 B 点跳到 C 点，这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

可是事实上，你去工厂看看，那里的生产状况往往不是这么简单。例如，在图 1-1 那条等产出曲线的外边，还有一个点 A，从工业普查的实际数据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在点 A 处生产了 $\bar{Q}$ 的企业。显然，在这一点上这个企业与在点 B 的企业有同样的产出，但它占用了比点 B 处的企业更多的资本和劳动。任何不在那条等产出曲线上的生产状态都叫做“技术无效率”状态，对应地，凡是处于图 1-1 那条等产出曲线上的点，都叫做“技术有效率”状态。因为只要我们比较一下这条曲线上任何两点所占用的要素投入，就不难发现，像点 A 那样既占用了更多的劳动又占用了更多的资本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也因此，图 1-1 的等产出曲线又叫做“效率边界”（efficiency frontier）。

在实证研究工作中我们往往用“非参量估计法”来判断诸如图 1-1 所示的那条“等产出曲线”，一点一点将企业的等产出曲线描述下来，找到对应于特定产出的效率边界。根据这样估计出来的效率边界，我们就可以指出那些在效率边界的右上方的样本点，说它们是无效率的企业。

德布鲁把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企业从点 A 到点 B 的效率改善被称为是技术效率改善（improvement in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注意，不是“technical”，而是“technological”。前者指纯粹技术，后者则包含带有组织规则（制度）的技术，是熊彼特意义上的“技术”。另一方面，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中已经学过，当要素价格变动时，例如，从 r_1 变动到 r_2 ，最小成本的生产状态沿等产出曲线相应变动（最小成本状态即成本预算线与等产出曲线的切点）。德布鲁把企业从点 B 到点 C 的效率改善叫做“经济效率”，因为这一效率概念是从要素价格变动和最小成本概念导出的，是用来刻画特定生产状态的经济合理性的概念。

上面的讨论还说明：从点 A 到点 B 的效率改善是工程师的任务，是管理者的任务，是企业家在生产过程内部发现和消灭“资源浪费”的努力的结果。而从点 B 到点 C 的效率改善才是教科书上通常所说的“经济效率”，它反映企业如何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例如 r ）调整资源配置（例如 K 与 L 的比例）。

我们注意到，在很长时间内，“技术效率”概念没有被纳入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只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后，生产过程开始有了“制度结构”，主流经济学才开始注意把“技术效率”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如图 1-1 所示的那样，各类经验数据表明，许多企业在点 A 仍然可以生存。张五常在《佃农理论》里也提出了这样的例子。这些企业怎么能生存下来呢？要么“完全竞争”假设失效，要么“完全竞争”假设仍然成立但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为充分解释这样的企业行为，我们需要增加一些假设。

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等产出曲线”从来不是连续的，它不是某个“闭集”的边界，我们只是抽象地假设了这些企业生产的是同样的产品和同样的产量。这样，如果我们仅仅假设“完全竞争”，那么我们就必须从经验数据当中去除那些不处于等产出曲线上的样本点，这正是教科书经济学所教给我们的，那里假设“没有任何两条等产出曲线相交”，也就是说，图 1-1 的点 A 只能是对应于 $\bar{Q} > \bar{Q}$ 的等产出曲线上的点，而不可能是对应于 $\bar{Q}$ 的生产状态。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样本点确实大量地存在着，不能简单地把它除去。于是，为了仍然保留“完全竞争”假设，我们剩下的出路就只有一条：增加假设。这就是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基本思路。

比方说，如果图 1-1 是从中国 1985 年工业普查“卡片本”数据绘制的，让我们来比较图 1-1 里面那些处于点 B 的企业和处于点 A 的企业，这两类企业都生产了 $\bar{Q}$ ，我们希望找到点 A 的企业为什么有这么多“浪费”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承认在完全竞争假设下会有资源的“浪费”，我们相信，一定有某些制约造成了这些“浪费”。也就是说，这些“浪费”其实是必要的，是效率所要求的。在近距离观察中我们发现，凡是在点 A 生产 $\bar{Q}$ 的企业都是中国北方的国营企业，而在点 B 生产了 $\bar{Q}$ 的企业都是南方的国营企业。在 1985 年的时候，南方的国营企业普遍已经实行了“自负盈亏”或“资产经营承包”制度，而北方的国营企业还停留在“厂长负责制”阶段。在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里面，奖金不得超过平均工资的两倍，而南方那些国营企业制度则允许“奖金不封顶”。这样，当一家处于点 B 的国营企业逐渐向中国北方移动的时候，它会发现效率日益降低，除非它突破厂长责任制的局限性，按照南方的模式经营企业，但为了引进南方的企业模式，它必须支付大量的制度改革费用，例如说服主管部门实施体制改革等。结果，在支付了这些“说服”费用之后，原来在点 B 的这家企业在中国北方成功地实施了例如“自负盈亏”制度，但当它把改革的费用分摊到总产出上，得到平均成本或单位成本以后，它发现这一成本恰好对应于点 A 的平均成本。这样，我们得到结论：南方和北方的国营企业的生产过程其实同样有效率（满足“完全竞争”假

设),只不过,北方的企业比南方的企业支付了更多的制度费用(从而表现为不在等产出曲线上的点A),而这一费用表现在图1-1那样的“L-K”坐标系里面似乎是一种“技术无效率”。

上面的讨论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承认“完全竞争假设”加上其他假设,可以解释那些在点A的企业的生产行为。但是其次,它又意味着“完全竞争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失效,因为如果全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点B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比点A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有更低的销售价格,于是就不可能观察到点A的企业。现在我们既然观察到了许多在点A的企业,那么市场就一定已经是分割开来的,不完全竞争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其实已经不再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了,它是张五常所说的“约束行为极大化”的经济学,但这一形态的经济学,其实已经被纳入了更一般的“理性选择”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等)。

在我们继续讲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从斯密发表《原富》到今天的经济学说史。说到《原富》这个名称,还有一个小故事。这本著作原名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最初严复把它译作《国富论》,后来,在二十世纪30年代改译为《原富》,这个名称比《国富论》要正宗得多,因为《国富论》含有浓重的“国家”学说的影响,反映我们中国人在西方列强压迫下大大增强了的民族观念,故这一译法有失原著宗旨。

下图为《大清一统天下全图》所收藏的1780年间马氏绘制的中国及周边世界天文地理情况——“靖边天文全图”,也是最早出现的中国地图之一。据说,马氏绘制地图的方法来自大儒黄宗熙1673年绘制的“中国地图”(似已失传)。我们从“靖边天文全图”的左上角看到,当时中国学者,通过传教士,已经知道世界上有“欧洲”(大部分),“亚洲”(中国区域)和“非洲”(北部及东部),并且还根据当时流行的误解,绘出了“大南洲”(the Big Southern Continent——十七世纪地理学对未知的澳大利亚和南极洲的统称)。但是,大体而言,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依然是“天下主义”的,与“中国”概念完全一致。如这幅地图所写,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只能叫做“道听途说”,所以,左上角的小图名为“海国闻见录——四海总图”。

到了严复的时代,西方人的“坚船利炮”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们居然打败了我们,而且似乎十分轻易。